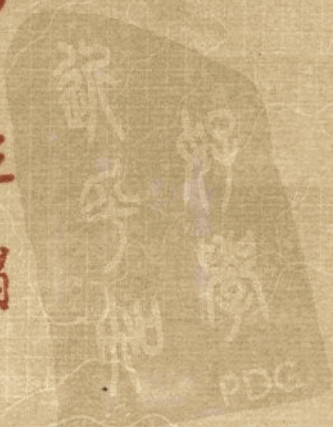


中國地圖史綱

王庸
著



弁 言

王庸先生字以中，江蘇省無錫市舊第六區塘山鄉靡巷橋村人。父親是位半耕半讀的鄉村蒙塾老師，一面教村童讀書，一面帶領家人從事農業勞動度日。王先生兄弟三人，兄和弟都早死，剩下他一人，家庭用全力來培養了他。在父親那裏受過小學教育後，又十分艱苦地讀完了中學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在蘇南教了兩年中小學；一九二五年又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當研究生。一九二七年研究所畢業，留所當助教。兩年後，到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教書，一九三一年到北平圖書館擔任編纂委員兼與圖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之後，他離開了北京，先後在浙江大學、湖南藍田師範學院、雲南大學、西南聯大、暨南大學、江南大學、河南大學、蘇州社教學院等校教書。解放後於一九五〇年到南京圖書館任特藏部主任，一九五四年調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兼與圖組組長，同時兼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以心臟病猝發逝世於北京板廠胡同寓所，享年五十六歲。

王先生待人極寬厚，而律己甚嚴；工作很認真負責，却從不計較個人的名位與待遇，在舊社會裏他疾視反動勢力一似仇讎，極不妥協，解放以後又能勇於自我改造，竭力爭取入

黨；他的爲人，在多方面都是值得我們向他學習的。他從事文教工作三十年，既是一個好教師，造就了許多後進人才；又是一個好的圖書館工作者，辦好了北京圖書館與圖部和南京圖書館特藏部；又是一個有成就的科學研究工作，爲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他對於社會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成就。

他的研究工作集中精力在中國地理學史方面，一生著述，大多數都是有關於這方面的；生前已經出版過的有中國地理學史（一九三八年商務初版，一九五五年修訂再版），中國地理圖籍考（一九四七年商務初版，一九五六年修訂再版），中國地學論文索引初編、續編（茅乃文同編，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北平圖書館出版）以及散見於報章雜誌的論文數十篇。這部中國地圖史綱是他一部已完成了初稿而未及改定的遺稿，此外又有關於山海經和水經注的未完成遺稿若干種。

在所有這些著作中，中國地理學史和中國地圖史綱是兩部最重要的代表作。二書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於前者是我國第一部地理學史的專著，並且自初版至今已將近二十年，也還沒有同類的書出版過；後者就是就前書中有關地圖的兩章擴大補充而成的，也是我國直到目前爲止唯一無二的地圖史。其次是由於我國過去學者對地理學史這一學科向來不夠重視，非但不曾有過全面而系統的專著，就是單篇論文也很稀少；因此作者動手撰述這兩部書時，前人

的研究成果可供他採擷的絕無僅有，書中的材料和論點，基本上都是作者直接從原始材料中鈎稽整理出來的；換言之，這兩部書對於中國地理學史這一學科而言，具有筚路藍縷的開創之功。

除了「唯一無二」和「開創之功」而外，我們還得肯定這兩部書的內容本身，無論在資料方面或論證方面，都有它不容忽視的價值。

以資料而言，研究地理學史主要當然得依靠歷代地理圖籍，兩書對這方面所下的工夫是很艱鉅的，並且是很切實而細緻的。作者一方面運用目錄學的方法，廣事搜輯了所有有關已佚的古代地理名著的記載；一方面又利用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機會，把該館所收藏的大量海內孤本或傳世極稀的古圖古籍全部翻檢一過，並擇要作出了簡要的介紹；這一項工作無疑是為中國地理學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以論證而言，由於作者的態度極為慎重，在沒有找到確切而完備的材料足資依據以前，他從不肯輕易作出論斷；因此書中的論斷不多，但偶有論斷，一般都是科學性很強，可以信從的。其中尤以風俗圖與地圖的一體分化和地圖與地誌的互為消長兩說，為古代中國地理學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問題提供了獨特而精湛的見解，意義十分重大。

自中國地理學史出版以來，不少讀者感覺書中講到地理知識和地理學說的發展的地方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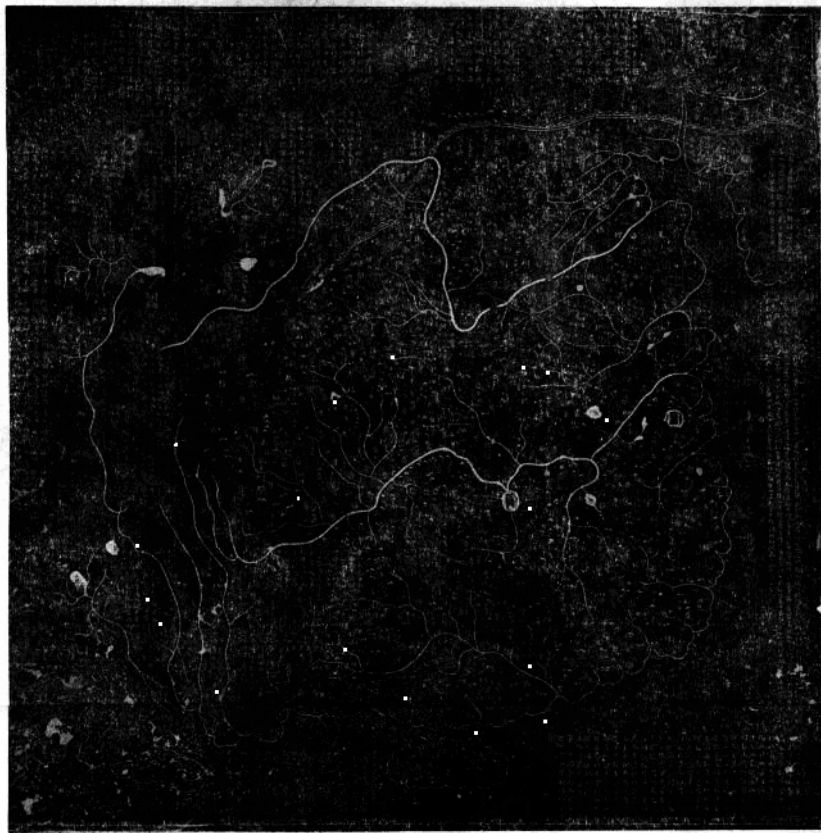
少，聯系到時代背景和各時代科學文化的發展的地方更少，認為還不能滿足學術界的要求。這是無庸諱言的事實。中國地圖史綱基本上也有此同病。但任何學術創始最難，王庸先生在無所因襲的條件之下憑一人之力完成了這兩部著作，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稱道的巨大成就。

中國地圖史綱稿在初稿完成後，三聯書店曾請侯仁之先生審閱一過，提出了些意見，可惜沒有等到把這些意見送交作者，作者竟遽爾作古！三聯為尊重學人的遺稿起見，決定逕以原稿問世。但原稿尚有文字脫譌錯亂處，引用史料或未詳註出處，因又約請顧頡剛、侯堉、袁鴻壽、馮寶琳諸位先生代為核對修訂。原稿無插圖，又請黃盛璋先生選目和寫插圖說明，向北京圖書館借用攝影。三聯和上列諸位先生都為這部遺稿的出版盡了努力，在此我謹代表作者的家屬和生前友好敬致謝意！

譚其驥 一九五七、一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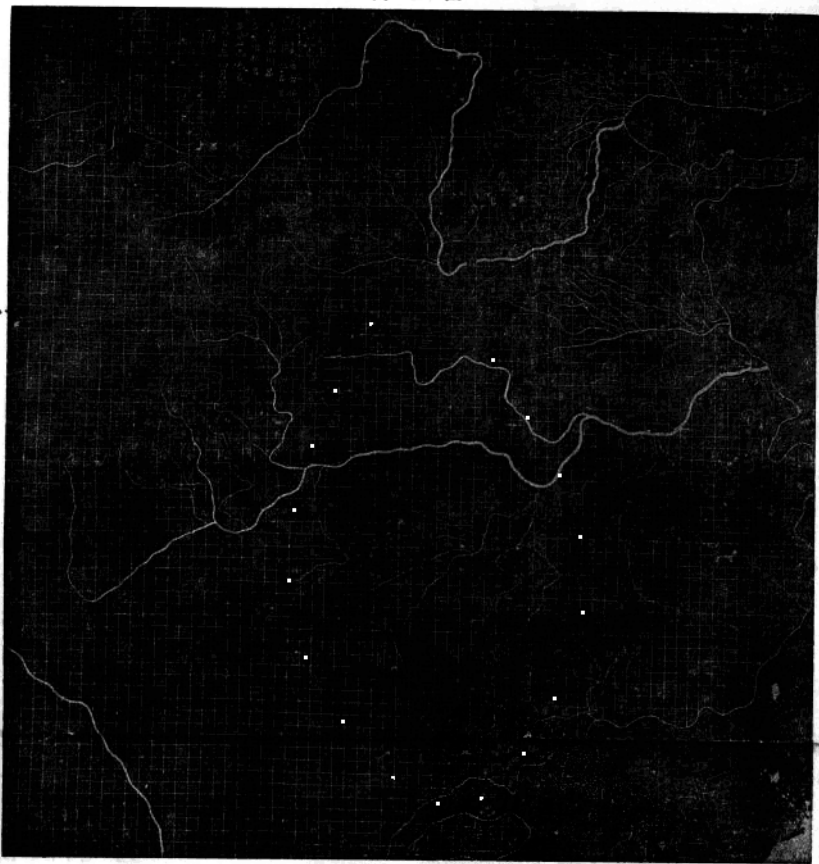
書中插圖有三幅是王先生舊著中國地理學史中選用過的，其餘是我補選的。補選依據兩點：（一）書稿中提到的，（二）名圖有代表性而現在還存在的，有些名圖由於書中沒有提到就沒有選。我寫的各國說明，有的看法與書中不盡一致，應由我負責，並不代表王先生意見。——黃盛璋附識。

华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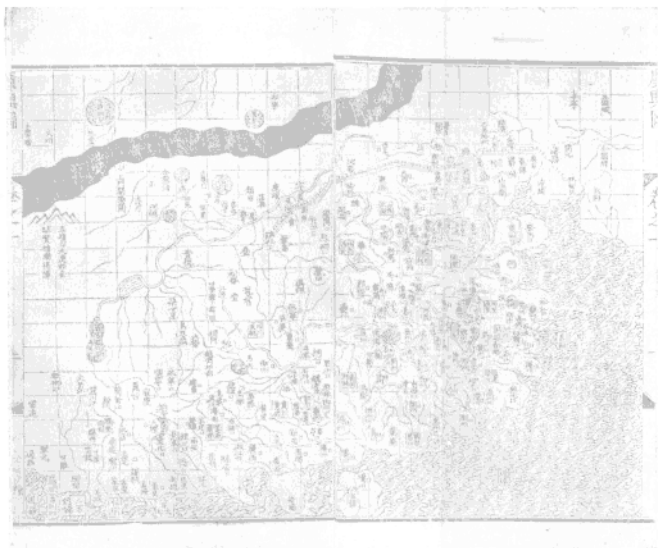
华夷圖伪齐阜昌七年（公元 1137 年）跋学上石，石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圖中称契丹为大辽国，原圖当为居于辽国地区的人所繪。公元 1125 年辽为金人所灭，所以圖輾轉落到伪齐政府的手里。圖制作年代不会很早，因为圖中提到宋代建隆、乾德、宝元等年号，它提契丹为大辽，但没有提到女真为金，当在金未建国号以前，据此可以推測圖之繪制年代。圖明确提到賈鵬公園，地名也有些是唐代的，如洛陽宋为西京，此圖仍沿开元以后的旧称，写作河南，即其一例。此圖有本于賈圖是肯定的，但賈圖以一吋折百里，有比例限制，此圖不圖方，繪法也較粗略，虽曾參考賈跋的海內华夷圖，由于变动很大，据此圖还不能推想賈氏原圖。原圖長寬各为 3.42 尺，这是据拓本繪制。

禹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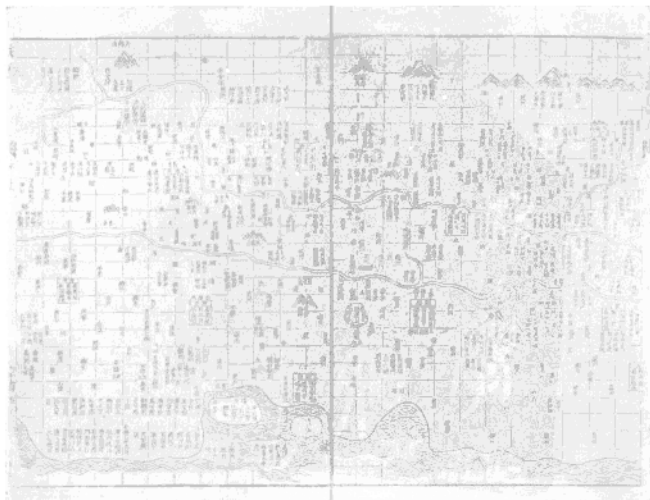
禹跡圖和華夷圖同刻在一石的正背兩面，正面是禹跡圖，背面（碑陰）是華夷圖，尺寸大小一樣。“阜昌七年四月刻石”，先華夷圖上石六個月，也當是錢學所刻。採取圖方的繪法，“每方折地百里”，橫方52，豎方73，總共3796方。圖上很多地名都是唐代的，有的地名在唐代文獻中出現也很晚，最遲的在貞元年間，正與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同時。圖上方注有條例，略等于后代的比例尺和圖例，和賈圖繪制情形很相符合，而此圖本身反不具备，這些跡象可以說明它很可能直接來自賈耽海內華夷圖，唐書賈耽傳說賈圖以一寸為百里，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此圖僅用賈圖的中國部分，所以叫“禹跡圖”。它與華夷圖同刻在一石的兩面，但它們的繪法不一樣，水系也有些不相同，這是應該注意的。

广舆图



广舆图是罗荪先到李思本画增补的。朱图现在不在，只能从广舆图中推知梗概。广舆图影响很大，一直到清康熙编绘新图以前，明清间地图差不多都出自广舆图。这是成的总图的第一页总图部分（据北京图书馆藏嘉靖本）。

皇明职方地图



这部经过明朝方地图，属于广舆图系统，但于罗荪有所增补，据他的自序说“因七氏之图而加广之”，陈氏在总序里记明舆图的大致，这里成的是总图的一部分（据北京图书馆藏嘉靖本），便于与广舆图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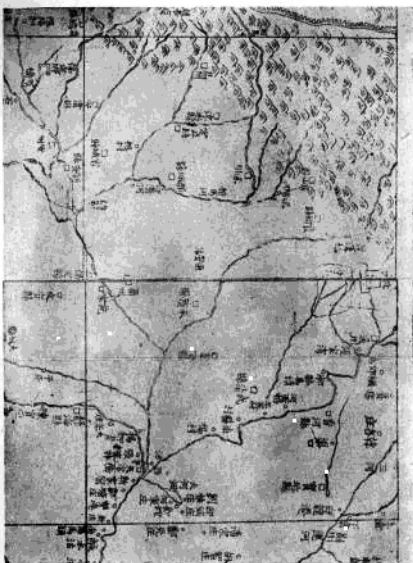


坤輿万国全圖是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進階中最好的一冊，万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之藻刻于北京，原圖分為六幅，每幅高約7.9英寸，寬約6.42英寸，裱合起來就是一種圓形的世界全圖。這幅地圖原寫字全印片(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本)橫排，共38頁，每3幅裝裱成一冊，从右而左。

過去不能確定利氏地圖究竟用過而为什么地圖，現在知道他是基于塞谷理(Abraham Ortelius)的地球全圖(Theatrum Orbis Terrarum)，莫氏世界圖1750年本和1896年本已在北京 常常圖形發現，莫氏圖中國本在東京而，利氏圖把它移到正中。

【塞谷理，利瑪竇坤輿万国全圖白字中明詞的譯詞，乃是利氏地圖及塞谷理，塞谷理，利氏地圖的“原圖”塞谷理而所傳何物地圖，西洋學者很早就注意，他們認為這圖所用的投影，同于莫 的萬載地圖(Gauths Terrarum Compendiosa)，卜里亞斯(Peter Plancius)的萬載地圖及塞谷理，又具有本和地圖學派的算法，因此他們推測利氏圖係合塞谷理與萬載地圖，莫士托(Gerardus Mercator)的萬載地圖 (Gauths Terrarum Compendiosa)，卜里亞斯(Peter Plancius)的萬載地圖及塞谷理(Nova et exacta Terrarum Orbis tabula Geographica ac Hydrographica)諸家之圖而為此圖，正文此布完全根據塞谷理的世界地圖，利氏不知塞谷理的書即北京北京地圖，因此不能決定利氏地圖的所傳何物西洋世界地圖究竟為第一種，1988年莫士托與利氏圖書館出版利氏 (P. Pasqual et al.)的利氏地圖 (Il Mappamondo Chineso del P. Matteo Ricci) 曾提到利氏地圖的所傳何物是在北京地圖館珍藏的1570年莫士托與利氏圖書館出版利氏的書及1595年利氏地圖以及1570年莫士托與利氏圖書館出版的書，其中有“世界地圖”，即利氏圖所本，如取用圖比較，不能看出確確在利氏，地圖知道利氏各力圖，利氏圖大抵係莫士托與利氏所不同的，利氏地圖以中國人的心理，將中國地位移到正中，又利氏在万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給皇帝的萬載中有万国圖一冊，葉金尼在利氏，這就是塞谷理的地球全圖，足見利氏所有此圖，所以稱利氏地圖為利氏地圖，利氏就是利氏的世界地圖，莫士托與利氏的關係及其比較，這也不能詳說，但這個圖與利氏，利氏在交代如上。【利氏地圖】

康熙內府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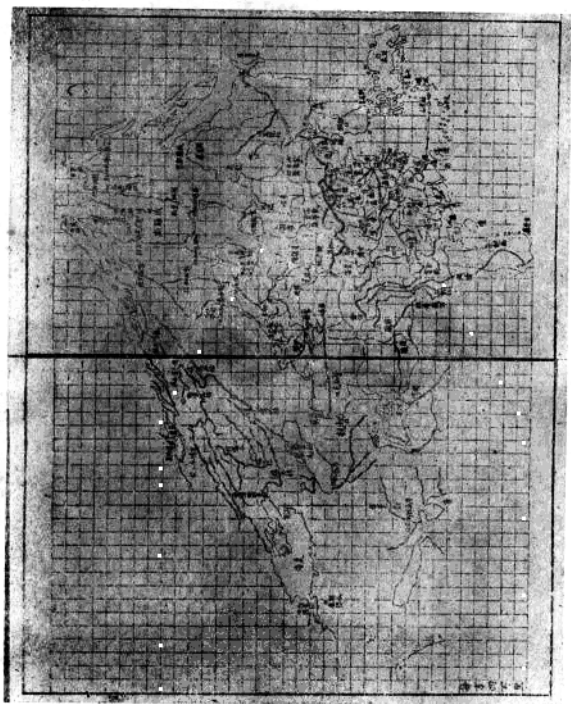
康熙內府輿圖是清廷所繪的木刻地圖，全圖長于地圖五十七年(公元1817年)，那時英國人海爾曼溫多爾家都未訂成尚未完成。此圖標記有中國海關所繪第一大進步。比滿洲宮博物院日圖更顯其地輿圖四十一號，全圖標為「滿洲宮內府一統輿圖」，右半行世。這圖是的是該圖之章及其附近部分。

乾隆內府輿圖



乾隆內府輿圖，又稱十三號圖，是清廷所繪在康熙內府輿圖的基礎上進行改繪的，全圖成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乾隆二十七年以後又經有修正。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在巴黎刻成圖一百零四號，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這裏標的是北京及其附近部分，以便與康熙內府輿圖比較。

大清一統輿圖(一)



大清一統輿圖原为胡林翼在湖北巡撫任內請鄭世治、晏登瀛繪制的，圖成未刻即死，严树森繼任，又請李廷璽、汪士鋐加以校正，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上刻，这里成的是該圖的總圖第一頁。

大清一統輿圖(二)



康熙、乾隆兩朝內府輿圖，收邊內而，外間甚少流佈。李兆藻和董祐誠都曾根據內府輿圖繪地圖，流傳也不廣。大清一統輿圖雖是兩內府圖，但它很多地方參考了李兆藻圖，所以與兩內府圖也不盡一致。這裏畫的是北京及其附近部分，以便與兩內府圖比較。

此圖除鬆轉處外，又採取畫方的辦法，每方百里（原圖每方長各1.5寸）。

目次

弁言.....譚其驥

- 第一章 中國的原始地圖及其蛻變.....一
- 第二章 中國古代地圖及其在軍政上的功用.....二〇
- 第三章 裴秀製圖及其在中國地圖史上之關係.....二八
- 第四章 山水都邑與州郡圖經之蛻變和結集.....三五
- 第五章 地圖的造送與十道圖.....三五
- 第六章 方志圖與賈耽製圖.....四三
- 第七章 十八路圖與邊境圖.....五四
- 第八章 朱思本輿地圖和羅洪先廣輿圖的影響.....六三
- 第九章 緯度測量和利瑪竇世界地圖.....七三
- 第十章 第一次中國地圖的測繪.....八九
- 第十一章 近代中國地圖的測繪.....一〇一

第一章 中國的原始地圖及其蛻變

地圖的起源很早，可能在人類發明象形文字以前就有地圖了。因為原始的地圖都是形象化的山川、道路、樹木，用圖畫實物來表示，以為旅行和漁獵的指針；而象形文字却多少帶符號性質，是比較進步的文化。近代原始民族，如愛斯基摩人、印第安人、澳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土人，都畫製有地圖和地形模型^(一)，作為旅行時的嚮導。中國古代有夏禹鑄九鼎的傳說，據左傳上所說九鼎的來歷是：「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九鼎是否夏朝的東西不能一定，甚至於九鼎是否存在過亦有人懷疑。但是這「鑄鼎象物」的作用在乎「避凶就吉」，使旅行的人知所戒備，有點同原始民族的地圖相像，則是無疑的事實。後來的山海經圖，大概就是從九鼎圖像演變出來的^(二)。至於現存的山海經，原來是有圖的，「經」不過是「圖」的說明或註脚^(三)，清人畢沅甚至說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是古代「土地之圖」^(四)。因為原始圖像只畫實際山水事物，至於各處的方位和距離不能在圖上表示出來；到了有文字以後，便在圖上用文字說明它們，如現在山海經中記着的：西若干里曰某某之山，又東南若干里曰某某之

山。這些記載，很像是地圖上的說明或註腳。後來圖散失了，只剩下這些說明，便成這部文無圖的山海經；但它的原始形態却是以圖為主體的山海圖經，或是有圖無文的山海圖。古鼎彝上以及山東發現的石刻畫像裏，有畫着奇奇怪怪的動物神道的，這和山海圖也許有些關係。

詩經周頌有「墮山喬嶽，允猶翕河」的詩句。鄭玄箋註說：「猶，圖也」，「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他的註解如果不錯，那末這個圖大概是和五藏山經的圖相類的，五藏山經中常講到祭山的禮品。在古代社會中，祭祀是有重大意義的，所以九鼎之被視爲國家重寶也是很自然的。國語周語上講周靈王太子晉說：「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興廢者，皆可知也。」呂氏春秋先識覽說：「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這裏所謂「圖法」與「典圖」，雖不一定有地圖，亦不一定是夏商的實錄，但這裏可能有山海經圖一類的原始地圖，而且至少是春秋或西周以前的一般情況。

古代的山海圖的具體面貌不得而知。晉代陶淵明詩有「流觀山海圖」。梁代張僧繇畫過「山海圖」（而且到宋代還存在，舒雅因而另作新圖。）（卷）但陶之所觀，張之所畫，是否是古山海圖之舊，亦不得而知。還有些不知名畫家畫的山海經圖和大荒經圖（卷），到明末吳任臣

作山海經廣註並有附圖五卷。他自己說是本舒雅舊稿；而清四庫提要說是「以意爲之」，不採取它。在他以前，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刻本有人替他附刻圖像山海經，圖中所畫神怪人物後面都畫着山水背景，多少帶些地圖性質，可能保留一些舒雅原圖的意味，而這個圖像吳任臣總該見到的，不過吳氏圖却把背景完全略去不畫罷了。後來汪紱著山海經存，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等，都有附圖，却都是依「經」作「圖」，「望文生訓」，和古時以圖爲主，以經註圖的體裁恰恰是顛倒過來。而圖的性質也完全是繪畫，沒有一點地圖的意義了。

山海經圖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五藏山經圖，畫着山、水、動物、植物、礦物等，而且記註着道里方位，顯然是地圖的形式；另一種是海內、外經圖及大荒經圖，主要是畫着神人怪物，不僅不註道里方位，連山水圖都沒有，已不像地圖的形式。這兩種圖並不能作明確的分割，不過從地圖的體裁上講，前一種比較進步些而後一種比較原始些罷了！不過有人講海內、外經比五藏山經晚，出自西漢人所作，這一說如果正確，也和我的說法並不矛盾。大荒經和海內、外經可能是晚出，但這些圖並不是從著錄時才開始有的，可能在五藏山經出現以前早已在民間傳摹，不過不爲一般文人學士所重視，所以便「不見經傳」，直到東、西漢之間才和五藏山經一同著錄爲山海經。大荒經和海內、外經是落後於五藏山經而較爲原始的，著錄的早晚是另一問題。海內、外經等如果是西漢人所作，却決不是西漢人的創作，而是西漢

時人根據了古本加以傳鈔、彙集或改編而已。

我們把大荒經圖和五藏山經圖籠統地稱爲地圖，也許有人認爲不恰當，因爲大荒經圖和海內、外經圖並不繪註山水、道里。可是，後來有一種叫做外國圖的，名義上算是地圖，而內容却和大荒經圖等相彷彿，只畫着各種異物圖像，而沒有山川、道里、方位等圖記。不過外國圖的原樣，現在我們已看不到，我說它與大荒經圖相彷彿是出於推斷。因爲至今它還保留一些圖上的記註文字，和大荒經和海內、外經的文字相像，還沒有五藏山經那麼平實。如水經注和唐人書中所引「外國圖」的文字，有「君子國」、「不死樹」、「大秦人「身長五六丈」等荒誕不經的記載⁽²⁾，簡直和大荒經和海內、外經差不多。還有西晉時裴秀所見到的「漢氏與地及括地諸雜圖」有「馮夷乘雲車，駕二龍」一類的話（水經注卷一河水注引括地圖），亦和大荒經的文字很相像，無怪乎裴秀認爲「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³⁾了！這些在漢、唐之間的外國圖和括地圖，內容還和山海經圖差不多。所以我們把大荒經圖和海內、外經圖認爲是原始型式的地圖，不是沒有相當理由的。因爲殊方異域的人物與事跡，不僅方位、道里不清楚，連事物的真相亦由於「十口相傳」而變爲離奇怪誕的神話。大荒經圖和外國圖，正是在這樣類似的情況下，具有類似的知識領域的繪畫家畫下來的，所以它們的著作時代雖然距離得相當遠，而它們的形式和內容却大致是相似的。像五藏山經所繪記的，多是比較熟